

张静如 著

唯物史观
与
中共党史学



湖南出版社

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

张静如著 ● 湖南出版社

K01
Z125

〔湘〕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李声笑
装帧设计:尹文君

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

张静如 著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交通学院印刷厂印刷

199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125 字数:146000

ISBN7—5438—1015—8
C·43 定价:10.80 元

目 录

导论	(1)
一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学	(7)
二 社会现代化与党史学	(48)
三 社会进化和变革与党史学	(95)
四 社会意识与党史学	(131)
五 个人和群众与党史学	(172)
结语	(211)

导 论

中共党史学是历史科学，已为党史研究者所公认。当然，党史学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但这是属于学科的功能范围，不必在学科性质上强调。以往，人们误认党史学为政治学科，是因为 1958 年中共党史被定为高校政治理论课后形成的观念。不错，从课程的作用来说，中共党史课无疑是应该对学生进行政治理论教育，但并不等于说这门学科的性质也随之变化了。这种情况在别的政治理论课中也存在，如政治经济学长期被确定为高校政治理论课，其学科性质始终属于经济学科，而不是政治学科。一般说来，课程的作用和学科性质是一致的，特殊情况下，两者也可以不同。人们没有注意到，高等学校历来都以不同时期对学生进行理论和思想教育的需要为根据，选定恰当的学科充任政治理论课。被选入的学科的本来性质，并不因此而改变。

不认识这一点，自然就会造成对党史学的性质在观念上的误差。这种误差，影响极大，不利于党史学按自身应有的规律发展。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必须“正名”，即正确理解党史学的性质。

为什么说党史学是历史学科呢？道理也很简单。凡研究和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不管它是整体的、断代的，或者是分类的，都应归属于历史学科。党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进程的纵向学科，其性质自然应该属历史学科。中共党史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时限之内的一部专史。在中国近现代时限之内，由于客体的结构上分层次存在，因而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就有多种不同层次的学科研究这段历史的内容。作为中国通史的组成部分的中国近现代史，是一个综合性的大系统，属于近现代时限之内的高层次学科。低于它的次级系统，有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这些专史又各自有自己的次级系统，形成第三、第四层次，以至更多层次。如经济史下面有生产史、流通史、分配史，等等；政治史下面有革命史、政党史、军事史，等等。而政党史下面又可分为共产党史、国民党史、农工民主党史，等等。可见，党史学就是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学问，专门研究这一特定领域中的特殊矛盾，并从中引出规律性的结论。

学科性质问题，是学科研究的前提。只有认清党史学是历史学科，才能使党史学的研究按照自身规律发展，从而取得更大成绩。摆错了位置，难免陷入误区。

作为历史学科的党史学，其整体结构亦即体系，应该是怎样的呢？与一般历史学科一样，它的主体部分是对中国共产党

历史全过程进行研究，从中找出规律，发挥其社会功能。在这个结构中，还包括为主体部分服务的其他部分，即指导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研究提供基础的史料学、文献学以及总结研究的正反面经验的史学史。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那么，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无疑也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举凡社会科学，都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但每一学科又有各自的独立的理论，如教育学有教育理论，文艺学有文艺理论，法学有法学理论，军事学有军事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无疑要以唯物史观为出发点，可它们并不把唯物史观作为自身体系的内容，两者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不易混淆。这大概与这些学科的研究领域，只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有关。

历史学科就不一样。历史学科也应该有自己学科的理论，那么唯物史观与历史理论是什么关系呢？多数研究者指出，唯物史观同历史理论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基础，是指导，不能代替后者，否则会导致历史研究的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又不尽然。

唯物史观是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一种哲学概括，不包括低于哲学层次的若干理论。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唯物史观的内容只包括：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社会基本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低于这个层次的理论，都是由此派生的。由于历史学科研究的对象是整体社会，而不是社会的某个部分，所以表述历史理论的内容时离不开唯物史观的最根本的内容。人们可以常见到这样的情况：研究者一方面强调不能

用唯物史观代替历史理论，另一方面在表述历史理论的内容时，又把唯物史观的内容列为首位。确实，如果表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不讲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不讲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人们总会觉得别扭，或者说就无法开口。可见，唯物史观与历史理论，不仅有前者对后者的指导关系，而且有后者包含前者的关系。说唯物史观不能代替历史理论是对的，因为后者还包括许多低于哲学层次的内容；如果说两者没有包含关系，就未必恰当了。强调把两者区别开来，是人们怕出现研究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的弊病。其实，承认两者的包含关系，与这种弊病的产生没有必然的联系。研究中出现这方面的问题，重要原因是没有掌握好或违背了唯物史观。

看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应该分层次。它既有哲学层次的内容，又有低于哲学层次的内容。也就是说，既包括揭示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唯物史观，又包括低于这一层次的关于历史过程具体规律的理论。后者，主要是解决历史过程的阶段性、发展趋向以及评价历史事件、人物、群体的原则等等问题。

唯物史观不是机械论，而是辩证地看待社会，从而形成历史辩证法。一般说来，它同具体科学的研究方法也不应混淆。但对于历史学科，也有它的特殊性。既然历史学科研究的对象是发展中的整体社会，那么在表述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时，根本不谈历史辩证法，也是不恰当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方法部分也应该分层次，既有方法论，又有具体研究方法。

作为历史学科的党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和一般历史

学科一样，只是由于党史学所研究的时限范围已到了近现代，因而有其自身的特点。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在党史学的研究中就处于极为重要的位置。

本书不是研究历史哲学问题，而是研究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如何贯彻到党史学领域之中，或者说在党史研究中怎样贯彻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为此，本书自然要通过实例，即通过党史研究中的具体问题进行考察，但又不是研究这些具体问题。如书中可能涉及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甚至对某个人物的思想和活动，对某个事件的过程做较细致的描述，但只是为举例说明应该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不是研究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本身。当然，由于讲清楚了在党史研究中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就不仅会促使党史学的发展，而且会直接有利于书中所使用的有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例子本身的研究。

本书所列的五个问题，都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有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意识两题一看便明，不用再做解释。社会进化和变革，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角度分析的；群众和个人，也是作为生产力的主体的角度考察的；至于社会现代化，则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终极目的。研究这些问题与党史学的关系，大致上可以说明如何在党史研究中贯彻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如果本书能把这种关系说清楚，从而对党史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那就很好了。但如果说不清，或者有的问题说不清，以至引起不同看法，那也是很好的，对发展党史学同样是有利

的。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本书的写作目的是阐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党史学的关系，以深化党史研究。从党史研究的现状来看，既有繁荣发展的一面，又有不够深入的一面。不足之处，简言之：曰浅、窄、粗。浅者，研究中叙述多，分析少，理论性弱；窄者，研究领域狭小，重复研究多，创新研究少；粗者，分析不细致，用材不讲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但很重要一点是研究中缺乏理论的指导。所以，研究唯物史观与党史学的关系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

一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学

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革命的最终目的这一唯物史观的重要观点，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关系，我是在1984年以后才开始注意的。但缺乏自觉的深入的研究，故尔认识上的提高不快。对下面提出的一些想法，我并不认为是这种研究的终结，确切地说仅仅是开始。

社会是个极为复杂的机体，要从千差万别的社会现象中，准确地概括出人类社会基本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实属非易。历史上无数研究者都试图予以说明，但都没有能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科学地做出回答。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而这两对矛盾又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基本矛盾的运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生产

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这一运动的起点。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停止消费，从而也就不能停止生产，所以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生产力的这种变化和发展，必然要引起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并迟早要发生变革。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又导致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这是一个连锁反应，从生产力开始，波及生产关系，再影响到上层建筑，并且只有上层建筑的变革才能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然后再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社会革命表面上集中于改变上层建筑领域的核心——政治制度，其实质是改变生产关系，而改变生产关系的最终目的，则又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曾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所以应该全力支持发展生产力的变革。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看，每一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都较旧的生产方式是一种进步。经过社会变革，打破旧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社会就前进了。可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但是，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在未取得政权之前，总是力争打破旧的生产关系，而一旦取得政权，就要保护和发展既得利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

整个社会服从于他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他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阶级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不同，“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迄今存在的全部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阶级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可见，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一心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变和提高全体人民生活而奋斗。因此，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就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头等的、最基本的任务。列宁在《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中说：“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

那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革命的最终目的这一唯物史观的重要命题，与中共党史学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我以为，如下几个方面很值得注意：

第一，应该注意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全过程的核心内容，从而要把它纳入研究对象的表述中。

为什么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全过程的核心内容呢？从道理上说也很简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现代化，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进行政治活动的目的，故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始终，一切其他活动都以此为中心并为之服务。如果把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做个粗略的考察，就会看得更明白。

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时起，就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

改变中国落后状态，拯救人民摆脱贫困境遇，过幸福生活为己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革命分两步走，先搞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革命的第一步，以解放生产力为主题。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得明白：“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更具体地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改变被束缚的生产力”。可见，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就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解放生产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解放生产力任务的主要手段是武装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一切工作，诸如根据地建设、白区工作，等等，都围绕这一中心而开展。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农村工作可算得上非常重要的事，因为它本身就是解放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即使如此，它也要为当时的全国解放战争服务，即要从物力上和人力上支援前线，起配合、辅助作用。如果不是这样，人民解放战争就不能取得胜利，解放区也保不住，更谈不上夺取全国政权，解放生产力自然成为空话。白区工作也是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扰乱敌人秩序，瓦解敌人力量，了解敌人情况等许多方面都有很大作用。即使这

样，它也不是主战场，只能处于配合武装斗争的地位。但是，由于人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长过程中，绝大部分时间直接接触的是解放生产力的主要手段和辅助手段，因而容易忽略甚至忘记革命的根本目的。对此，毛泽东于 1944 年 3 月 22 日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曾向干部们强调要有个正确的认识。他指出，许多同志把政治、军事放在第一的位置是对的，因为不把敌人打掉，什么也谈不上。但是，不能忘掉搞政治、军事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说：“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经济是政治、军事的基础，政治、军事是上层建筑。地基是经济，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经济，政治、军事之所以放在第一，是因为如果没有它们，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就没有可能谈其他问题。”“日本帝国主义占了我们的地方，我们还有什么生产力可以发展？这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所以，“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

民主革命时期，虽然以解放生产力为主，但并不是说生产力没有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一定阶段里得到发展。这是因为在漫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每一革命阶段的结局都多少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为革命势力所长期占据的较大的局部地区，生产力确实得到一定的解放，并有所发展。前者最明显的是 1924 年到 1927 年的大革命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使生产力得到解放，因而对生产力的发展

确实起了作用。1927 年到 1937 年期间，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历史上从未有的水平，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非常重要的和较为直接的原因是 1924 年到 1927 年大革命所起的作用。后者无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都可以找到实例。既然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有根据地的，而且夺取政权是一块一块进行的，所以，根据地内就要进行经济建设，同时革命战争的费用也要由根据地供给，这一切都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由于根据地内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就为发展生产力创设了前提条件。如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很大成绩，生产力有了发展。到 1943 年，整个边区达到“丰衣足食”，粮食不但够吃，而且有余。在工业方面，毛巾、袜子、陶瓷等达到全部或大部分自给，食盐则除自用外主要是外销。又如解放战争时期的山东解放区，虽由于遭受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由于许多地方有严重自然灾害，生产力被破坏程度大，但经过该地区党和政府采取救灾措施，到 1948 年秋季，农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据统计，仅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京沪杭战役中抢修铁路桥梁，购置战争器材、供应前方副食品及支前经费等项开支，就达人民币 91528 万余元，山东解放区担负 50% 左右。可见，如果该地区生产力没有一定发展，是无法做到的。关于在根据地内要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毛泽东也有过论述。他在 1944 年 4 月 3 日给任弼时修改讲演稿时加上些话，强调要搞经济建设。他说：“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

作，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当然，在中国共产党未能夺取全国政权的情况下，对发展生产力始终不可能投入更多的力量。也就是说，在民主革命时期，解放生产力仍是主要的任务。这个任务，在 1949 年基本上完成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历史进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主要任务是继续解放生产力。与民主革命时期不同的是，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建国初期，有许多民主革命遗留的解放生产力的任务，也有稳定经济形势，恢复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完成这一任务，对于缺乏掌管全国经济工作经验的中国共产党说来，是十分艰巨的。随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其他各项民主改革的完成，中国社会面貌、社会风尚起了很大变化，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同时，经过 3 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1952 年工农业总产值，比 1949 年增长 77.5%，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 1936 年增长 20%。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它规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很明显，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内，完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主要手段是“一化三改”。“一化三改”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亦即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同时并举。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发展生产力，当这个过程结束之后生产力将得到更大的解放。毛泽东在 1956 年的最高国务会议
